

〔捷〕雅罗斯拉夫·普实克著
李燕乔等译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

● 比较文学丛书 ● 比较文学丛书 ● 比较文学丛书 ●

在观念与方法论亟待更新的时代，文学研究需要走向世界；《比较文学丛书》沟通中外文学，引进世界新潮，探索各国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它协助您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深刻认识本民族文学的独创特色。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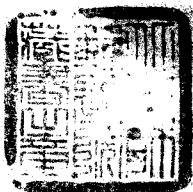
〔捷〕雅罗斯拉夫·普实克著

李燕乔 等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5262



湖南文艺出版社

1125262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

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主编

〔捷〕雅罗斯拉夫·普实克著 李燕乔等译

责任编辑：罗尉宣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625 插页，2 字数，178000

印数，1——1900

ISBN 7—5404—0050—1/I·46

统一书号：10456·229 定价：2.20元

17038/02

出版说明

比较文学是一门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以及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其他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独立学科。它诞生至今不过百年左右的历史,但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已经在世界文坛上站稳了脚跟,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树和批评方式,发挥自己的影响,帮助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总结文学的普遍规律,概括更丰富的文学现象,从而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深刻认识自己民族文学的独创性。当今各国文学家对这一学科普遍具有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我国早在五四时期已开始有东西方思想、政治、社会、哲学以及文学的比较研究,解放以后,停顿了较长一个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比较文学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引起了重视,在短短几年间发展成一门“显学”,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走向世界的良好开端。

为了在对外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比较文学在我国的进一步繁荣,为了满足高等院校开设课程和广大文学爱好者知识更新的迫切需要,我们组织出版了《比较文学丛书》。

《比较文学丛书》选目注重学科本身的逻辑组合,首期工程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一)比较文学理论建设;(二)东方文学比较研究;(三)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四)国外比较文学研究概貌。

其中前三辑由深圳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负责编辑，第四辑由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负责编辑。乐黛云同志专为《丛书》撰写了总序。

《丛书》体例以本国学者对某一问题深入探索的专著为主，兼收国际知名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研讨专集；在方法论上，“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科际研究”兼收并蓄，力求借鉴国际比较文学界已形成的各家学派之长，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把我国乃至东方极为丰富的文学遗产和新的文学硕果，放到世界各民族文学中去，比较研究，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新的文学事业，并在这一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新的理论特色。

出版《比较文学丛书》在国内尚属新举，我们的希望是借此能为文学事业的发展扎扎实实做点工作。由于缺乏经验，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我们期望听到海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的宝贵意见。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十月

比较文学的名与实

——《比较文学丛书》总序

乐黛云

二十世纪以来，人类大大改善了对于客观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懂得了必须以认识主体时间为一维的四维空间，第一次从无垠的星际世界看到人类共同生活的蓝色球体。新的认识必然引起各种观念，包括文学观念的更新，孤立、绝缘、割裂、封闭的状态已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早就预言，随着“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①在人类知识领域，各种学科相互切入、渗透、融合，各种边缘学科的勃兴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世界，正在走向综合。

二十世纪后半叶比较文学的繁荣正是这一趋势的产物。几十年来，比较文学大大开拓了自己的领域。

最初，比较文学仅仅被定义为“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正如基亚所说：“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的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

① 《共产党宣言》。

渗透”^①。他们强调“各国文学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②。比较文学着重研究的是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的来源（渊源学）和媒介（翻译——媒介学）。

后来，比较文学自身的发展突破了这种只拘泥于事实联系的局限，人们发现并承认完全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也具有比较研究的价值。

从内容方面来说，文学反映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人类共有的欢乐、痛苦和困扰往往可以从全不相干的文学体系中看到。例如关于爱情与事业的冲突，我们可以从白居易的《长恨歌》、洪昇的《长生殿》看到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悲剧，也可以从拉丁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看到罗马的创建者离开迦太基皇后黛朵，造成后者死亡。另外如对于人生短暂而自然却永恒长存的感怀，对于自我的认识和对于人生的领悟，对于理想的追求与破灭等都常常在完全不同的文学体系中以相同或不同的形式得到表现，构成了并无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学之间的一种可比性，这种比较在比较文学中被称为“主题学”。

从形式方面来说，一定的文学形式往往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例如小说这种文类就不可能产生于远古社会，它的出现总是与商业化、都市化和印刷术的发展有关，往往都有较大的思想动荡或新思想的产生作为其兴起的背景，都需要比较自由的语言媒介，都有强大的叙事传统作为基础，其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往往是从对现实客观世界的描写逐渐转入对人

① 基亚：《比较文学》，顾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4页，198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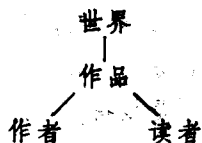
② 卡雷：《比较文学》序。

物内心世界的刻划……他如戏剧、诗歌等文类也都可以在不同的文学体系中找到发展的共同规律。这些共同规律和划分文类的标准以及各种文类发展的不同途径等也构成了一种可比性。关于文类的比较研究被称为“文类学”。

关于文学发展历史的比较研究则是一门最近才兴盛起来的学问。例如关于大型诗文集的编排，西方多是编年序列，或以篇名的第一个字母为序。如荷马史诗就曾按希腊文的二十四字母，编成二十四卷；品达罗斯的颂歌按所歌颂的庆典的时间先后为序编排。中国的诗文集则大致按文体区分。如萧统的文选：一赋、二诗、三骚、四七（“七”指特殊的文体，如《七发》、《七辩》等）……日本的《古今和歌集》又别具一格：描写自然的诗按春夏秋冬四季排列，描写爱情的诗则按爱情体验的发展顺序排列。东西方关于文学发展历史的记载也有不同方式。西方文学史很多是根据“时期”或“文学运动”来划分，中国则多半根据“朝代”、“文体”和“流派”。探索这些差异的原因，比较其优劣，发挥其特长将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文学史的比较研究与主题学的结合也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例如杨贵妃的故事从《长恨歌》到《梧桐雨》，再到《长生殿》；王昭君的故事从《汉书》中的片断记载到《汉宫秋》到《双凤奇缘》，再到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这种同一主题的发展序列往往给我们提供文化、社会、思想风习变迁的丰富信息。在欧美文学中也能找到很多这样的发展系列。例如浮士德的故事和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故事的不断改写。显然，这许多作品构成的不同系列各有自己的革新和承传，东方和西方关于这种革新和承传的过程都有哪些共同点和不同点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

由于以上关于文学内容、形式、发展过程的比较研究，比较文学越来越向理论方面发展。正如厄尔·迈纳所说：“近十五年间最引人注目的进展是把文学理论作为专题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①人们越来越感到文学是属于世界的。离开了对于不同文学体系的综合考察，许多文学问题就难于得到圆满的解答。文学理论家们已经不满足于他们的理论只能解释某种文学体系，而是希望它既能解释西方文学，也能解释东方文学。许多学者正在探索可以解释各民族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文学理论架构。例如美国文学批评家阿布拉姆斯在他的名著《镜与灯》中提出艺术四要素（即作家、作品、世界和读者）的理论。他把这种理论归纳为一个简单的三星形：



他认为这个图形可以概括所有文学批评理论：或强调作品反映客观世界；或强调作品如何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心灵特征；或强调作品对读者的教育意义和认识意义；或把这一切都视为文学的外延分析而只注重作品本身。另一位美国学者唐纳德·A·吉布斯写了《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与中国古代文论》一文，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也纳入阿布拉姆斯的架构之中。美国加州大学叶维廉教授在探索建立一套足以概括中西文学理论的架构方面也作了许多很有意义的工作。

综合，不仅表现为类同和汇通的研究，也表现为对于殊异

①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几个课题》，见《中国比较文学》，1984年，第249页。

和差别的追索。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真正了解一个文学体系的特点，必须从一个外在的立足点，有其他文学体系作为参照系统才有可能。日本比较文学学者矢野峰人说：“大凡特性唯有在比较之中才更为炯然生辉”。① 越是不同的文学体系，越能辉映出彼此的特色。过去，人们总认为全然不同的东西方文学根本没有可比性，近来，这种观念已有根本改变。例如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就曾以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发展和重视理论研究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特色来讨论十五年来的比较文学，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不少院校努力把亚洲各国文学引进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不再把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各语系之内。② 无论从西方人的观点来看东方文学，或从东方人的观点来看西方文学，或用西方文艺理论来探讨东方文学现象，或以东方文艺理论来探讨西方文学现象，都会开拓文学研究领域，得出有意思的结论。例如关于易卜生的研究，如果是跟在欧洲人后面，用他们的方法来研究易卜生，很难作出什么重大贡献；如果我们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研究易卜生和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影响及发展，这种“反馈”会大大丰富关于易卜生的研究。

综合，也包含在新的基础上，在新的领域内，有关各种文学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以及某种文学体系的迁移和流播的综合研究。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说：“我们现在谁也离不开谁，是其他民族的思想培育了我们的才智……不论我们知道不知道，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是世界公民……印

① 《比较文学》，南云堂出版，第7面。

② 见厄尔·迈纳：《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几个课题》，译文见《中国比较文学》，1984年，第250页。

度、中国和日本的文化成了我们的思想源泉，而我们的思想又哺育着现代的印度、中国和日本”。①一九二三年柏林就出版过德国人利奇温的专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②，四十年代陈铨写过《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也出现过许多文章。目前，研究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学影响的文章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要研究中国文学，不了解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全面的。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明显诱因。五四时期，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潮的传入是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重要契机。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决定了中国左翼文学几十年的动向。特别是五四时期，如此众多的世界文化思潮大量涌入，与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古老文明发生撞击，作为一个众多文化相互影响、冲突、排斥、吸收、改造、变形的范例，在世界文化史上实属不可多得。事实上，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中国、印度、阿拉伯文化都出现在亚洲。关于亚洲各文化体系的相互影响还是当前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当然，综合还包含文学与人类其他思维形式，如自然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和艺术形式之间的比较综合研究。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艾德治曾强调“比较文学最简单的定义可以解释为通过一个以上的民族文学的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或者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间的关系”③。目前，所谓“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重要组

① 转引自北京大学《比较文学译文集》第161页。

② 有中译本，朱杰勤译，1962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③ 欧文·艾德治：《比较文学：内容与方法》，1969年，伊利诺斯大学出版。

成部分。必须突破文学研究闭关自守的状况，必须沟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等的界限，这样，就可以为文学研究输入新的生命。我国文艺界正在探索将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新观念如耗散结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运用于文学研究的可能性，恰与上述呼吁相合。文学与社会学（文艺社会学）、文学与心理学（文艺心理学）、文学与思想哲学（艺术哲学）的关系，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交相阐发更是急待开展的重要课题。

最后，作为各种文学体系相互沟通的手段——翻译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不可或缺的内容。

总之，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综合、联系、交流的时代。中国正在走向世界。比较文学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已形成自己独立而广阔的学科领域，正是我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我国辉煌的古代和当代文学应该真正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灿烂瑰宝而为世界人民所共享；我国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传统文学理论应该成为世界正在寻求的文学理论综合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新的文学理论如果不能解释瑰丽多彩的中国文学现象就应该说是跛脚的。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通过比较与世界沟通，在比较中研究我国文学与他国文学的殊异和类同，以世界所能接受的方式呈现自己。

从我国文学本身的发展来说，开展比较文学研究也是当务之急。经过长期的封闭与隔绝，我们特别需要以世界文学为背景，以他种文学为参照系统，重新估计自己，重新认识自己。我国文学理论将在这种重新估价和认识中完成重大突破，走向更高阶段。如前所述，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对世界各种文学比较、选择、吸收、改造，从而丰富自己的历史。正确

理解和总结我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找到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结合点，对于开拓我国文学视野，指导今天的创作都会有很大帮助。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兄弟民族都曾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如蒙族、藏族的宏伟史诗，纳西族、苗族的神话传说等。进行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不仅能促进兄弟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而且可以总结出各种民族文学的特色及其相互影响、融合而仍保持其独立完整的规律。我国又是一个侨民众多的国家。华侨在许多国家仍然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也有自己的文学。如马来西亚的“马华文学”，新加坡的“新华文学”，美国的“美华文学”。这类文学往往反映出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接触最前哨的种种动态，是研究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极好标本。另外，我国地处亚洲中部，与阿拉伯诸国、伊朗、印度、日本、朝鲜和东南亚都曾有过历史悠久的交往，在文学的相互关系方面也都有很值得追寻的历史踪迹。

无论是我国各族人民文学的比较研究、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和东方各地区比较文学的研究目前都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中国比较文学将填补这些空白，为世界比较文学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比较文学丛书》正是在以上的思想指导下编纂的。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我们希望听到读者的批评。

一九八五年六月于深圳大学

前 言

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亚罗斯拉夫·普实克教授开拓的业绩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他对中国白话文学的起源、种类以及社会和历史背景进行了不懈的探索。长期以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学的学生们一直把这种探索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几年前，有一部题为《中国历史和文学》（荷兰，多德雷赫特，雷德尔博士，1976）的内容丰富的著作问世，书中收集了普实克先生研究传统文学的绝大部分重要学术论文。然而，他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却一直没有汇集成册，这类文章绝大部分在欧洲的各种杂志上以长篇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过。本书选辑了普实克教授在十数年之间（1957—1969）发表的论文，旨在填补这个显而易见的空白，并向那些缺少其他途径接触欧洲学术刊物的学生（尤其是在美国和其他非欧洲国家的学生）提供他的一些有创见性著作的典范。承蒙普实克教授的厚意，本选集中文章的篇目完全是他让我自己选择的。所以，在最后确定的文章安排中如有不足之处应由我本人负责。而这些文章内容上不可估量的价值则当然要归功于普实克教授。

我之所以决定选择这些文章，有三个方面的考虑：文章的学术质量和创见性，它们在普实克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总体研究中的代表性，及其作为学生的基础阅读和教学材料的适用性。由于我个人的局限，也许对普实克教授的文章在价值上估计得

并不充分，但我所选的文章都是对我和我的学生们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论述。如果不是要实际考虑本书的成本、使它能为更多的学者和学生们所接受，我本来还想再多收进一些文章的。另外，他用其他欧洲语言写的重要文章也有一些没有收集进来，这也令人惋惜不已。不管这些遗漏会带来什么弊病，我仍然深信，本选集充分体现了普实克先生的著作中一个突出的特征：广博的视野与深入细致的分析相结合。在这些文章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批重复出现的论题。根据我的意见，要理解普实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思想，这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普实克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题目之一是新文学和中国古典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国文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才形成其现代文学，普实克作为为数不多的对传统和现代的中国文化都能应付自如的欧洲汉学家之一，敏锐地觉察到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复杂反响。传统的中国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这正是他着力研究的题目）所具有的多样性、自发性、艺术创造性和不断增长的活力，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忽视所谓的士大夫文化——其道德影响、其语言的精确性以及表达上的技巧和复杂性。传统文学的这两个方面似乎使人想起胡适的有关看法：他认为后者是在逐渐僵化而前者则日趋活跃，因而他断言，自从宋代以来，白话风格是中国文学主要的、有生命力的传统。与包括胡适在内的绝大部分五四文学先驱不同，普实克先生强调指出，士大夫文学抒情的一面，尤其是古典诗歌所表现的抒情性，同样不失为一份不朽的遗产，五四作家就是从这份遗产中陶冶了他们的文学灵感。

这种“抒情”传统往往集中表现在作者的主观感情和在情

调、色彩或想象方面的艺术感召力上。很多现代中国作家的著作都有类似的表现——鲁迅和郁达夫就是其中两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抒情的敏感性绝不仅仅是文人士大夫的特长。虽然普实克并没有深入探讨明代出现的文人小说——即受到上层教育的文人学士使用的白话小说形式，他们是出于某种原因才选择这种“通俗”形式作为表达艺术想象的媒介——我们还是可以推断：上层文人“盗用”通俗文学体裁的现象，也许正象普实克所考虑的那样，是推动不同文学体裁逐渐融合的因素之一。它反过来也表明，在以往的三四千年里，文人的和通俗的两种文学是结合在一起的。按照普实克的观点，从明末到晚清，日记、笔记、小品文以及小说方面日益通俗化的趋势说明：从前在诗歌和散文之间，在道德说教的、上层的“伟大传统”同较为无拘束的、怪诞的通俗传统之间存在的障碍正在被打破。普实克认为，清朝末年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偏重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诸如沈复的《浮生六记》、刘鹗的《老残游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之中。因此，正如普实克二十年前就指出的那样，晚清时期可以专门划作中国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一个关键的过渡时期。

普实克虽然花了很多精力来分析晚清的小说作品（本选集中就有几篇论述），但在谈及这一时期文学的艺术成就时，却没有多加粉饰。他发现，大部分晚清小说——也许《老残游记》是个例外——缺乏表现现实所需要的那种高深的技巧。就这一点来讲，他认为从1917年到1937年的中国现代小说要强得多。他反复引证的例子是茅盾的小说作品。茅盾在创作中追求——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普实克所说的“史诗”的质量。

“史诗(的)”一词，在普实克笔下往往是形容词而不是名词，

用来概括一个比诗歌更为广泛的文学体裁范围。它与“抒情(的)”一词相对立而成为艺术反映现实的另一个主要手段。如果说郁达夫和鲁迅的小说在抒情性方面使人联想到诗歌,茅盾的小说则以其大规模地、客观地表现生活和社会的艺术构思而具有“史诗”的气魄。普实克认为,这一“史诗”的起源应当追溯到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不过,他还是通过大量细致入微的研究来证明茅盾曾得益于欧洲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理论。根据普实克的分析,虽然茅盾承认他是一个自然主义作家,却不象左拉那样通过集中反映作品主人公的个人命运而涉及“生活的一个侧面”。因此,可以说,茅盾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继承了——或者说恢复了——中国小说创作的“史诗”传统,这种传统一向是表现广阔的社会画面,而并不突出任何个人形象。在茅盾的小说里,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个人的力量总是无法解脱地纠缠在一起。当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肯定的是把社会经济力量及其附属的阶级结构作为贯穿他大多数小说的主题。不过,正如普实克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在这位最具有史诗特征的中国现代作家身上,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某种主观意愿:作品主人公的个人情感不是被压抑了;相反,在与更大的历史力量的相互作用中,这种情感表现得更生动、往往也更痛苦。这种客观与主观、“史诗”和“抒情诗”的辩证结合正是现代中国文学主流的一个重要标志。普实克也许曾一度偏重于研究抒情性作品,不过他还是很明智地兼顾到了两者。

在勾勒中国现代文学这两条“准传统”的脉络时,普实克还力图证实它们可能同欧洲文学存在的“一致性”。如前所述,他从茅盾的叙事性作品中找到了同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特定联